

## 「絳頭毛面」新探

何根海

池州師範專科學校

《晉書·張昌傳》在記載張昌起義時稱：「妖賊張昌、劉尼妄稱神聖，犬羊萬計，絳頭毛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sup>1</sup>其中「絳頭毛面」應作何解釋，學術界雖偶有涉及，然僅流於輕描淡寫，未有確當的闡釋。許多學者將「絳頭」解釋為「起義軍頭著絳色巾」，是義軍的一種標記；<sup>2</sup>或認為「『以絳科頭』、『絳頭毛面』與『著赤幘』」（《後漢書》卷八六《南蠻傳》），皆為蠻族習俗所尚，可見張昌起義軍中有不少蠻族人民。<sup>3</sup>至於「毛面」，學者們的解釋也是五花八門，迄無定說。或解釋為「（頭上）插着羽毛」；<sup>4</sup>或認為是「以馬尾作髻」；<sup>5</sup>或認為是「以雞毛附面」；<sup>6</sup>或認為泥面沾毛以防蚊蟲瘴癘。諸家觀點，筆者不敢苟同。我認為「絳頭毛面」係義軍在戰場上表現特定文化內涵的裝扮和扮相。這類裝扮和扮相是義軍將五斗米道與民族圖騰迷信相結合組織發動起義的直觀形象的反映，它是江漢流民起義的一個重要特點。我們在研究「絳頭毛面」時斷不可忽視這種真實而隱秘的文化特徵和意蘊。

張昌屬廩君蠻中之義陽（今河南新野縣）蠻，是五斗米道信徒。「絳頭」係五斗米道徒的一種標幟。張昌起義活動地區如荊州南陽郡、江郡、南郡；徐州琅琊郡；揚州吳郡、會稽郡；豫州諸郡，在起義前這裏各族人民便接受了五斗米道。當時五斗米道信徒一種主要標識便是「戴絳」。玄光《辯惑論》「畏鬼帶符妖法之極一」載：「張角黃符，子魯〔張魯〕戴絳。」<sup>7</sup>又《三國志·孫策傳》註引《江表傳》云：「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漢家法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南夷所殺。」<sup>8</sup>可

- 1 《晉書·張昌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2613。
- 2 郭沫若《中國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頁77。
- 3 朱大渭《中國農民戰爭史·魏晉南北朝卷》，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36。
- 4 郭沫若《中國史稿》，頁77。
- 5 司馬光《資治通鑑》，香港：中華書局，1956年，卷八十五，頁2681。
- 6 萬繩楠《魏晉南北朝史論稿》，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頁128—131。
- 7 玄光《辯惑論》「畏鬼帶符妖法之極一」，見《弘明集》，《四部叢刊》影印明刊本，卷八，頁四下。
- 8 陳壽《三國志·孫策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1110。

見南陽在漢末便有「常著絳帕頭」的五斗米道信徒在活動。漢末張修、張魯在巴郡傳教，南陽人陰長生、張津先後在南陽傳道，地處巴郡、南郡、沔中的義軍核心力量廩君蠻人，當早已接受了五斗米道。六郡流民在益州起義後，張昌曾逃離吏職。在他「潛遁半年」中，<sup>9</sup>很可能利用五斗米道在民間組織聯絡羣衆，「聚黨數千人」<sup>10</sup>後起義大規模爆發，旬日之間，衆至三萬，「皆以絳科頭」，被新野王司馬歆斥爲「妖賊」，足見張昌及其部衆幾乎全是五斗米道信徒。所以從某種意義上看張昌率領的賈、廩君、槃瓠、漢諸族人民的聯合起義也是以五斗米道爲思想內核的宗教意義上的聯合起義。也正因諸族流民和貧民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故五斗米道徒張昌發動起義後極易得到廣泛支持和聲援，一時「百姓波蕩，從亂如歸」，「荆楚從之如流」，<sup>11</sup>幾個月內便「擁衆百萬，橫逸宇內」，使西晉「六州之地，柯振葉靡」，<sup>12</sup>「江河間一時焱起」。<sup>13</sup>又張昌在江夏（今湖北安陸縣）建立政權後，改姓李名辰，此舉可能與道教特殊傳統有關。《太平廣記》卷一引《神仙傳·老子》云：「老子數易名字，非但一聘而已。所以爾者，按《九宮》及《三五經》及《元辰經》云：人生各有厄會，到其時，若易名字，以隨元氣之變，則可以延年度厄。今世有道者亦多如此。」<sup>14</sup>張昌聚衆石岩山後改易姓名，一方面意在「度厄」，另一方面亦意在與傳說中道教鼻祖李耳（老子）爲一家而標榜他是道教正宗，其爲五斗米道徒殆無可疑。另外，張昌更名李辰亦當與漢代「劉氏復興，李氏爲輔」之讖有關。史載張昌易姓名後，亦使丘沈更名爲劉尼，「稱漢後」，「盛車服出迎之，立爲天子，置百官」，<sup>15</sup>昌爲相國。其目的乃彰明自己屬封建正統，既爲正朔所歸，便可堂而皇之地率衆起事和建立政權了。可見「絳頭」是五斗米道徒的一種宗教意義上的標幟，也是張昌利用宗教組織發動起義的重要標誌。

值得注意的是，漢晉之際，對江漢地區少數民族下層五斗米道徒來說還有一種特殊標記，就是「泥面」。玄光《辯惑論》「制民課輸欺巧之極二」云：「塗炭齋者，事起張魯，氏夷難化，故制斯法。乃驢馱泥中，黃鹵泥面，擲頭懸仰，挺植使熟。此法指在邊陲，不施華夏。」<sup>16</sup>張魯因氏夷（蠻）難化而創「泥面」之法施諸少數民族信徒，而張昌部衆中相當一部分正是「難化」的賈、槃瓠、廩君等少數民族，因此「泥面」在所難免。張魯誣稱少數民族信

9 《晉書·張昌傳》，頁2612。

10 同上註。

11 《晉書·五行志》，頁825；干寶《搜神記》，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七，頁101。

12 歐陽詢《藝文類聚·人部·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卷二十五，頁451。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附錄一《抱朴子外篇自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369。

13 《晉書·張昌傳》，頁2613。

14 《太平廣記·神仙傳·老子》，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卷一，頁2。

15 《晉書·張昌傳》，頁2613。

16 玄光《辯惑論》「制民課輸欺巧之極二」，《弘明集》，卷八，頁四下。

徒只有塗成「泥面」才能證明自己對五斗米道「癡僻之極」。<sup>17</sup> 很顯然，「泥面」是漢族官方五斗米道教主為少數民族道徒專設的具有「懸糜」<sup>18</sup> 欺騙性的宗教懲罰。後來義軍在泥面之上再簪上毛，謂之「毛面」。總之，從宗教的角度看，張昌起義部眾有兩個明顯特徵：一是「絳頭」，一是「泥面」。

對「毛面」的釋析，應著眼於古代江漢諸族的圖騰習俗。筆者認為，「毛面」即是在「泥面」之上簪上圖騰聖物的毛羽，裝扮成圖騰的模樣。考諸典籍，我們不難發現江漢諸族中至少有三種圖騰物值得我們研究，它們是犬、虎、鳳。所以「毛面」便是泥面簪毛而扮成犬、虎、鳳的模樣。

江漢諸蠻中以武陵、長沙、廩君、板楯四蠻為最大，它們分佈犬牙交錯，形成南蠻的四大系統。但諸蠻中有一種模模糊糊的相同的創始傳說，即諸蠻均有過槃瓠為其始祖的神話，亦即以槃瓠作為共同的民族圖騰物，槃瓠即盤瓠，即盤古，即犬。《魏略·西戎傳》謂氐人「其種非一，稱盤瓠之後」。<sup>19</sup> 三苗後裔的武陵蠻亦有始祖為槃瓠的傳說；<sup>20</sup> 干寶《晉紀》亦有「武陵、長沙、廬江郡夷，槃瓠之後也，雜處五溪之內」之說。<sup>21</sup> 又長沙蠻為瑤，瑤人自言為槃瓠之後，兩漢以後著作對此多有記述。<sup>22</sup> 武陵蠻為苗，陸次雲《峒溪織志》云：「苗人，槃瓠之種也。」<sup>23</sup> 此外劉介《苗荒小紀》、劉錫蕃《岑表紀蠻》、黃閔《武陵記》、瑤族的《過山牒》、《還盤王愿的起源》、畲族的《高皇歌》等等均記載該地區敬狗、祀狗、膜拜狗的情形，模糊地反映了槃瓠為諸蠻共祖共祭的主題。

秦漢時期，在夷水（今鄂西南清江）流域、巴中、黔中一帶（略當今川東南、黔東北、鄂西、湘西）居住着「巴郡、南郡蠻」，有巴氏、樊氏、相氏、暉氏、鄭氏五姓。其中巴氏首領務相被推為五個氏族的共主，號為廩君，後遂以廩君為族名，稱廩君蠻。《後漢書·南蠻傳》載：「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sup>24</sup> 《搜神記》載：「江漢之域有獮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能化虎。」<sup>25</sup> 廩君蠻除犬圖騰外，族人尚有崇虎和以人相虎的習俗。這種圖騰習俗也反映在後代的圖騰藝術中，據民族學者考證，今湖北西

17 同上註，卷八，頁五上。

18 同上註。

19 《魏略·西戎傳》，清王仁俊輯，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20 參見《後漢書·南蠻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2829。

21 見《後漢書·南蠻傳》註引，頁2830。

22 參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蠻》，汪士漢輯《秘書廿一種》本，清嘉慶九年（1804）重刻，頁三十一有「瑤本五溪槃瓠之後」語。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四部叢刊三編》本，《湖廣上》頁三十五有「夫五溪種落，實繁有徒，大率皆槃瓠後」語。

23 陸次雲《峒溪織志》，見《叢書集成初編》第三〇二六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卷上，頁1。

24 《後漢書·南蠻傳》，頁2840。

25 干寶《搜神記》，卷十二，頁152。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南、湖南西北、川東南和各鄰近地區，1949年後發現了大量虎鈕和虎紋的文物，如湖北松滋、長陽出土有虎鈕鐵釵，湖北宜昌出土的青銅文物上均飾有虎紋。<sup>26</sup> 從敬虎拜虎和虎文化遺物來看，廩君蠻確是以虎作為該族的圖騰崇拜物。

江漢諸族中尤其是荆楚地區還有崇鳳的習俗。在江漢地區發掘的文物中，鳳的雕像和圖像不可數計，動物紋中鳳紋亦最多。人們視鳳是至真至善至美至尊的神鳥，認為只有在鳳的導引下，人的精魂才得以飛登九天，周遊八極。<sup>27</sup> 這樣鳳便成了天人之間人神之間的媒鳥，久而久之，人們便認為鳳也與其祖先有着某種親緣關係，鳳鳥便是其祖先之靈的化身，鳳即被視為該族的圖騰聖物。同時，鳳又是古代美政的象徵，它一出現則天下和平、豐饒、自由、幸福，它蘊涵着極其深邃的社會歷史文化內容。<sup>28</sup> 也正是在這種圖騰心理和迷信心理的支配下，張昌建立政權後，在石岩山作宮殿，「又於岩上織竹為鳥形，衣以五彩，聚肉於其傍」。衆鳥飛來啄食，聲稱鳳鳥下降，故建元為神鳳，<sup>29</sup> 以示「有鳳凰之瑞，聖人當興」。<sup>30</sup> 這些活動雖簡樸稚拙，但卻明確反映了義軍崇鳳的一個事實。

張昌所率部衆民族來源廣泛，可以說賈、槃瓠、廩君、漢諸族兼而有之。衆所周知，流民的流動也是一種文化的流動，隨着起義的展開和義軍隊伍的不斷壯大，各族人民帶來了不盡相同的宗教信仰和迷信風俗。各族文化在起義戰場實現了自身的傳播擴散，豐富了各族文化自身的內涵。一時江漢戰場出現了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秦隴文化、吳越文化輻輳交匯的獨特文化現象，它們之間或聚並或擯棄或吸收或融合，甚至還出現各族習俗互不干涉並行不悖的局面。義軍之中有犬圖騰崇拜者，有虎圖騰崇拜者，有鳳圖騰崇拜者，在崇巫術重淫祀的文化環境裏，他們裝扮成自己祖先或民族圖騰神的模樣，或有祖先和民族圖騰神的某些特徵。故「毛面」即是在泥面之上簪上狗毛、虎毛、鳳毛(山雉、孔雀、雄雞等)裝扮成狗、虎、鳳的模樣。戰場儼然是一個兼收並蓄、色彩紛呈、流動開放的民族文化廣場。

義軍這種圖騰裝扮和扮相，目的是幻想憑助祖先之靈的超自然的力量來抵禦、威脅、懾服敵人，在腥風血雨的戰場上減少一點恐懼感；同時利用圖騰形象來鼓舞士氣，激勵將士「挑刀走戟」拼死殺敵；也企圖以此種方式乞求祖先神靈庇佑平安和獲勝，頗具一種護身

26 參見童恩正《古代的巴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頁123。

27 參見張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7。

28 參見《太平御覽》卷九引《河圖帝通紀》(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頁46)及《山海經·海內經》、《淮南子·繆稱訓》、《論語·子罕》。

29 《晉書·張昌傳》，頁2613；王象之撰《輿地紀勝》卷七七《湖北路·德安府·景物》下，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年，總頁460。

30 干寶《搜神記·牛能言》，卷七，頁101。

符的性質。同時，這樣裝扮和扮相還有謳歌亡靈祭奠死者的寓意，乞求祖先保佑戰死將士的靈魂得以超度升天，期望亡靈能像祖先一樣魂化白虎，像鳳鳥一樣逍遙四方周遊八極。這種寓意與義軍係五斗米道信徒有關，因為道教的一個重要使命便是超度亡靈禳災祈福。值得注意的是，起義軍在戰場扮成「毛面」，還含有濃厚的巫術迷信色彩，此類裝扮和扮相正是江漢諸族崇巫思想的一種變相反映。

綜上可知，若將「絳頭毛面」簡單地解釋為「頭著絳色巾」，「插着羽毛」或籠統的「蠻族習俗」是經不住推敲和深究的；至於將「毛面」解釋為「以馬尾作髯」、「雞毛附面」和泥面沾毛以防瘴癘蚊蟲亦無確切史料印證，似有附會之嫌，難以服人。我們認為「絳頭毛面」是西晉末年張昌起義一個重要特點，它是人民羣衆利用五斗米道和圖騰迷信習俗舉行起義的真實反映，這類裝扮和扮相正是義軍將五斗米道與圖騰崇拜相結合的生動形象的註釋。它增強了義軍的凝聚力、內驅力和戰鬥力，也表現了各族人民英勇善戰和不怕犧牲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A Fresh Examination into the Meaning of the Expression “Crimson Scarf and Hairy Face”

(A Summary)

He Genhai

There has so far been no clear and unambiguous explanation of the expression *jiangtou maomian* 絳頭毛面 (crimson scarf and hairy face). The author holds that “crimson scarf and hairy face” was the appearance under disguise of members of Zhang Chang’s insurrectionary army in the battlefield, displaying some specific cultural traits. “Crimson scarf” and “mud face” was the symbol of Five-Dou-Rice Taoist priests in the Jiangnan area. “Hairy face” reflects the ancestor worship psychology of Jiangnan’s various clans, in a tortuous way regarding dogs, tigers and phoenixes as the national Totem. “Crimson scarf and hairy face” was the audio-visual image suggesting that Zhang Chang used Five-Dou-Rice Tao and national totem superstitions in the uprising.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